

近代移民企业家与鼓浪屿国际社区的构建

孙峰¹, 陈芳²

(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思政教研部, 福建 厦门 361021;
2. 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 文化遗产保护处, 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 近代百年, 鼓浪屿从传统的居民聚落空间演变成具有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移民企业家群体凭借强大的资本、浓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现代的观念和视野, 成为推动鼓浪屿国际社区空间格局构建和社会近代化变迁的重要力量。采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方法, 分析和探究移民企业家的群体特征及其与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鼓浪屿; 移民企业家; 国际社区; 华人华侨; 群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1) 03-0109-07

一、引言

近代百年, 鼓浪屿国际社区社会形态的流变, 大体经历了鼓浪屿国际居留地(1842—1902)和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1903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 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 擅自将鼓浪屿划为其居留地, 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纷纷进入, 鼓浪屿上的房屋、教堂、领事馆等设施大量出现, 厦门地方当局鼓浪屿社区的管理权逐渐被削弱, 社区建设和治理采取民间宗族乡绅自治的模式; 后一个阶段, 鼓浪屿公共租界变为高品质国际社区。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外居民的居住融合等因素的历史形塑下, 鼓浪屿国际社区在社区治理模式、文化形态、住区和景观营造等方面呈现出独特面相。

1843年, 厦门正式开埠。在优越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排华政策、“实业救国”思潮以及投资获利思想的鼓舞和驱动下, 大量海外返乡华人华侨纷纷移居鼓浪屿, 鼓浪屿上的华人也由1911年的近12 000人增长到1941年的43 000人^{[1]356}, 在鼓浪屿居民比例和纳税主体上, 华人都成为绝对的主力。有清以来, 政府大幅度地削减了地方的财

政预算^[2], 社会公共领域的投资越来越依赖于乡族自筹资金或绅商的捐输。为数众多的归国华人华侨通过海外巨额财富的积累, 完成了绅士化和精英化转型的移民企业家群体, 携巨资返乡, 投资鼓浪屿银行、侨批、公共事业, 引入了海外近代城市社区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制度, 促使鼓浪屿社会生活、城市建设及治理的主导权从西方转到海外返乡的华人华侨手中, 造就了华人华侨精英群体对鼓浪屿公共事务强大的话语权, 对近代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及群体特征分析

华人华侨中的移民企业家群体在鼓浪屿国际社区的构建过程中, 成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尤其在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阶段, 甚至成为主导性力量。

(一)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 “个人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 几乎是直接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定的, 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更

[收稿日期] 2020-06-13

[基金项目] 厦门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项目(厦社科研[2020]C30号)

[作者简介] 孙峰(1980—), 男, 山东禹城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深”^[3],自南洋等地大量返乡聚居的海外华商群体,经过多年的打拼和苦心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通过投资创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按照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概念,姑且可以称他们为“移民企业家群体”。“移民”指的是他们均来自海外(主要是南洋地区);“企业家”指的是该群体的投资行为特征^[4]。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厦门交涉员刘光谦称,鼓浪屿“居民户口约在四万左右,十之六七系属各县回国华侨,实闽省精华荟萃之区”^[5]。近代鼓浪屿移民企业家群体规模较大,李清泉、黄奕住、叶清池、曾上苑、黄仲涵等是这一群体的重要代表。移民企业家群体皆来自海外,他们在国外投资创业,成为豪商巨富,携资返国;他们的经济行为来往于南洋和中国之间,具有跨国性;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在鼓浪屿乃至厦门拓展新的行业和领域,具有创新性;努力改变家乡和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落后面貌,展现出值得肯定的“企业家精神”。福建南安籍的黄奕住,号称“印尼糖王”,年二十一,只身随亲友至荷属爪哇三宝垄谋生,初以码头华工剃头为生。1914年创办三宝垄“黄日兴行”,并在三宝垄、棉兰、巨港、泗水及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分行。一战后,糖价上涨,获利数千万盾,成为东南亚四大糖商之一。1920年分别在新加坡和菲律宾创办华侨银行和中兴银行,同年携资2300万美元归国,定居鼓浪屿,积极投资房地产(建造房屋160多幢、独资开辟鼓浪屿“日兴街”)、公用事业(创办厦门电话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和金融业(创办厦门“日兴银号”、投资750万的上海中南银行)^[6]。

1904年成立的厦门商会,实质就是移民企业家群体组织。原因有二:会员入会资格之一,要求在厦门从事实业^{[7]180};商会重要成员除林尔嘉二三人外,大多拥有外国国籍^{[7]183}。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的行业分布、资产规模可以由此组织管窥一二。厦门商会总干事共10人,除两人经营业务不明外,从事金融业者(银行、钱庄、当铺)4人,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50%;贸易业者2人,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25%;粮食及消费品销售者2人,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25%。

商会共有成员45人,除18人经营业务不明外,金融业者10人、贸易业(茶商、纸商)5人、粮食及消费品销售者7人、兼营金融及贸易者1人、买办或洋员雇员2人、新式生产事业或专业人士2人。金融业商人在商会内所占比例最大,亦最具实力。商会会员个人财产从12000元至100万元不等^{[7]183}。

抗战前厦门符合国民政府工厂法规定的工厂仅有21家,资本额53350000元(仅及厦门市商业资本总额的12.67%),雇佣工人730人(仅及厦门市商店雇佣人数的2.56%),年产品值1829972元,约80%到90%的工厂都是由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8]。

(二)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分析

20世纪初的鼓浪屿,随着海外移民的大量增加而变成侨乡社会,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享有强大的话语权。通过对该群体特征的系统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他们在鼓浪屿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1. 籍贯分布。美国学者顾德曼认为:“籍贯是某人姓名、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在法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9]出于样本分析效果的考虑,笔者选择了当时鼓浪屿社区较有影响的移民企业家共59人进行数据分析。经统计分析,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过程中移民企业家籍贯分布呈现以下特征(见图1)。

图1共统计鼓浪屿声望较著的移民企业家59人,其中籍贯为福建(泉州、漳州、福州、厦门)的为57人,比例高达96%,广东(中山、梅县)人数为2人,占比仅为4%。这一时期移民企业家绝大部分来自福建,尤其是以泉州(37人)、厦门(10人)、漳州(8人)为主,分别占福建人总数的63%、17%、13%,三地总人数合计55人,共占福建人总数的93%。由此可见,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整个过程中,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主要是来自福建,尤其是来自厦漳泉为主的闽南地区。

2. 来源地域。英法等国殖民东南亚各国后,极力推行排华政策,致使大批海外返乡移民携带巨资,迁居鼓浪屿。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在鼓浪屿近代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股强

势力量深度介入, 不仅提供了近代城市社区管理理念, 也构造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图谱。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侨居国别和地区, 大致如下 (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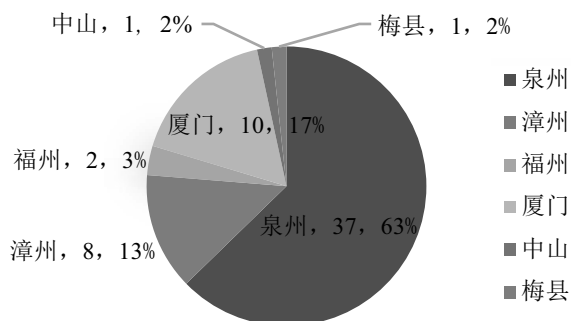


图1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籍贯分布图^①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籍贯、人数、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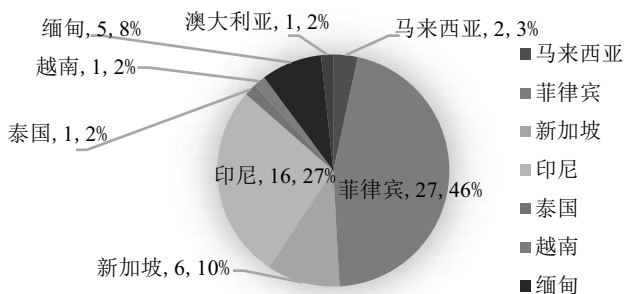


图2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侨居国别统计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国别、人数、百分比)

由图2可知,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 分布地区较为广泛。其中以菲律宾最多, 有27人、其他依次是印度尼西亚16人、新加坡6人, 缅甸5人、马来西亚2人, 泰国1人、越南1人、澳大利亚1人。这些东南亚国家随着18世纪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入侵, 较早成为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地, 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 具有了相较于晚近鼓浪屿更多的近代化气息。尤其是华族多居住于城市地区^{[10]22}, 耳濡目染西方现代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及理念是必然的。综合图1和图2, 可以看出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海外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泉州以侨居菲

律宾、新加坡为主; 福州以侨居马来西亚、印尼为主。^[11]

3. 教育背景。由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早期出国谋生的华人华侨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近代以来海外返乡的移民企业家群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文化水平以私塾和私塾以下为主, 共45人, 占总人数比高达76%, 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薛敏佬 (密执安大学)、林谋盛 (香港大学)、林文庆 (爱丁堡大学)、林庆年 (北京大学), 共4人, 占比仅为7%, 具有硕士学历的只有林文庆1人。

另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文化水平虽普遍较低, 但他们见识广、能力强、社会活动能量大, 尤其是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中人数占比极高的福建人, “福建人喜住城市而精于经商, 在上述各地华社内均握有经济的最大势力”^{[10]17}。这一群体在侨居国作为富有华商, 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 处于华社的上层, 与殖民政府当局关系也较为密切。(2) 身处异国他乡的艰难环境,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深切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具有强烈的投资教育及文化事业的情怀。

4. 任职情况。事实上, 上述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除了具有工商业者这一最显著的身份标签, 往往在本兼职方面呈现出多重化特征。由于材料局限, 笔者未能对59位企业家本兼各职一一求证, 但可以确认其中40人 (67.8%) 身兼多职 (见图3)。

由图3可以观察到3个问题: (1)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本兼各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侨务、教育等多个领域。以福建南安籍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黄奕住为例, 其身兼厦门商办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鼓浪屿华人议事会主席团主席、中南银行董事长等职, 积极捐赠厦门大学图书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图书及设备, 从事鼓浪屿房屋及市政建设, 对厦门尤其是鼓浪屿近代城市社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 从跨国主义理论来看, 海外华人华侨“经常跨越国家和

^①资料来源: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鼓浪屿文史资料》(上、中、下), 2010年; 何丙仲主编:《鼓浪屿华侨》,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戴一峰编:《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年; 洪卜仁主编:《厦门华侨记事》, 2017年; 洪卜仁主编:《厦门文史丛书》, 2015年。

文化疆界,其文化和身份认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跨界性”^[12]。据可靠史料查证,在上述论及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中,至少有11位在侨居国和中国均肩负重要职务。例如,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在南京政府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同时又是马尼拉中国商会的会长;新加坡华侨林文庆更是身兼厦门市政会会董、新加坡华人议员、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卫生司司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这些移民企业家以“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心态,推动物资、资金、技术、文化等在侨居国和母国之间双向流动。大量的跨国实践活动,对晚近“双半社会”的中国,尤其是像近代以来作为侨乡社会的鼓浪屿等地区,于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3)近代企业家本兼各职及其相关的活动区域大多与城市相关,甚

至华人中某些有威望、有领导才能与富有者被殖民当局任命为所在华社的官员,间接统治华人社区(居住区)。例如,菲律宾的叶清池、印尼东爪哇三宝垄的黄仲涵都曾担任甲必丹,后者甚至升至军事阶级最高者玛腰。他们在归国迁居鼓浪屿后,在厦门市政会、鼓浪屿工部局担任会董、华董,侨居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理念也随之被融入到鼓浪屿近代城市社区中。印尼华侨黄奕住所在的三宝垄市,长期被“不卫生城市”之名所困。在荷兰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的治理下,三宝垄市市政建设大为改观,这令黄奕住印象极为深刻。作为厦门城市建设决议机关的市政会和鼓浪屿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正是参照了三宝垄市政委员会,开展市政工程设计、审计和筹款等工作^[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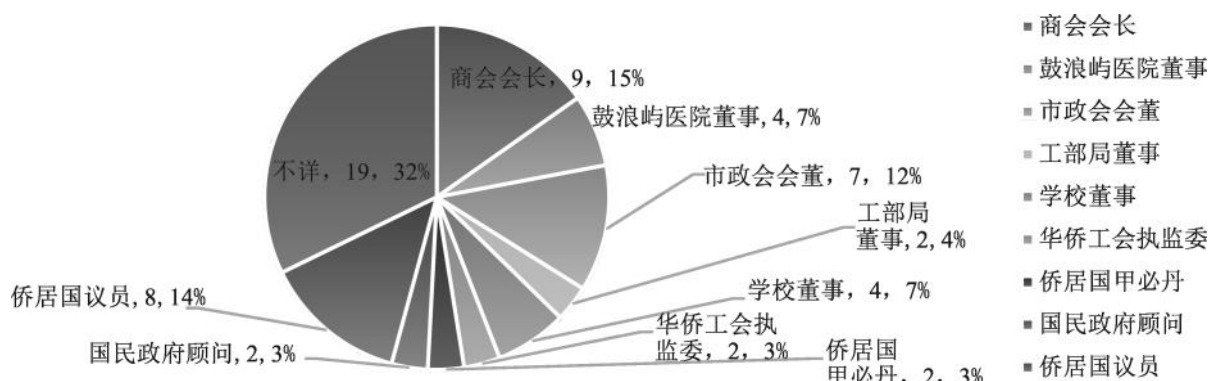


图3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任职情况一览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职务、人数、百分比)

三、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是鼓浪屿国际社区构建的主要推手

海外移民企业家群体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现代意识及开阔的眼界,造就了鼓浪屿国际社区聚落空间格局和社会的历史变迁,成为推动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重要力量。

(一) 鼓浪屿国际社区的概念界定

当前学术界判定国际社区标准主要有5点:以城市地域里的社区为基础;社区居民的国际化,境外人口需要聚集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呈现多元多样的特征;组织制度、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具有国际标准,并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社区治理水平;

国际社区应是一个成员和谐生活、文化相互包容的社会共同体。因此,鼓浪屿国际社区是以鼓浪屿地域为基础,国内外居民共同居住、社区成员国际化、国内外优秀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风景优美的、拥有高品质文化的高端社区,具有深厚的社区治理底蕴。以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内涵上看,“国际”代表了鼓浪屿居民构成及文化形态的国际化 and 多元化;“社区”是指鼓浪屿作为高品质的生活社区,具有完善、宜居的公共服务体系。外延上看,既体现在社区建筑、风貌等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文化等精神层面^[14]。鼓浪屿国际社区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相比较:(1)在社区建筑风貌上,前者呈现出多元化风格。而后者则呈现出纯欧版空间格式化的倾向^[15]。(2)社区管理上,鼓浪屿国际社

区华侨构成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16];后者则设立工部局,在租界行政上实行统一管理。(3)鼓浪屿国际社区在吸收先进文明和异质文化精髓基础上建构出近代市民文化和市民精神,后者则没有。

(二) 近代移民企业家对鼓浪屿国际社区构建的参与和贡献

1. 鼓浪屿国际社区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有力推动者。近代以前,鼓浪屿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孤悬海上的一座小岛,聚落格局相互分割且分散。鸦片战争后,外国侨民大量迁居鼓浪屿,在鼓浪屿岛的东南部山势较高处及周边海滨区域建造房屋居住,华洋分别聚落形成一定的区隔。20世纪初,随着闽南籍海外移民大量聚居,逐渐成为鼓浪屿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仅20至30年代十几年间,返乡海外移民就在鼓浪屿岛上兴建了1 014座楼房^[17]⁴⁵。另外,1924年至1936年间,鼓浪屿工部局颁发的970份建筑执照中属于返乡海外移民及其眷属的占75%^[18]。相当数量的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积极投资社区房地产和道路网、自来水等公共事业,鼓浪屿公共社区的空间格局迅速扩展,公共设施趋于完善,近代城市社区基本成型。

2. 鼓浪屿国际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时期,随着相关配套设施逐渐健全,社区功能得以逐渐完善,近代城市社区基本成型。随着海外返乡移民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必然成为鼓浪屿城市社区纳税的主体。1931年,“中国人税额为63 997.75元,外国人为12 209.14元,中国人所付产业税已经为外国人5.2倍”^[19]。经济地位的提升使海外返乡移民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海外归侨精英群体作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强劲介入,逐渐占据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主导地位。工部局作为新成立的社区管理的统一机构,始终都有华人参与其中。1924年工部局增设的顾问委员会,就是以鼓浪屿海外归侨精英为主体的。董事会作为工部局的领导机构,1926年洋董事的人数由6名减少为4名,华人董事由1名增加到3名^[20]。来自南洋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鼓浪屿海外返乡移民,尤其是闽南籍海外移民中的商人构成的移民企业家群体,在海外西方殖民地生活或经商获得了在国内难以

企及的文化、阅历和经验,他们迁居鼓浪屿之后,西方先进理念和社区管理模式也随之引入,造就了一个迥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城市社区。

3. 鼓浪屿国际社区多元文化的重要建构者。闽南籍海外移民为主体的鼓浪屿社会精英群体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具有务实、求新、兼容的精神,对构筑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图景发挥了桥梁和中介作用。宗教上,“鼓浪屿华人民间的民间信仰,是与闽南民间信仰同源、同构的”^[17]²²¹。海外返乡移民的文化观念在根本上坚守着闽南海洋文化的特质。同时,民间信仰上泛神化和实用主义的特点,使得鼓浪屿海外返乡移民群体对异质文化保持一种开放心态,“既能以开放兼容的胸怀接受多元文化,又能够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异域文化和谐相处”^[21]。外国侨民带至岛上的一神教信仰的基督教,因为被建构为当地众多神灵之一,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842年到1942年厦门的教徒从2名发展到15 000名^[1]²⁸⁹。

建筑上,海外移民以欧式建筑或折中主义的南洋华侨建筑为时尚,自建别墅和近代园林,风格琳琅满目,混杂了南洋、西洋和闽南的多种文化因素,为社区营建活动注入了活力,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更是积极参与,大兴土木。“在鼓浪屿,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中国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的后裔所有”^[22]。印尼华侨黄奕住的黄家花园、菲律宾华侨许经权的番婆楼园林即是重要代表。

另外,海外移民带来的西方音乐、绘画、体育等社会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碰撞,造就了鼓浪屿的多彩文化和特有气质。

4. 鼓浪屿国际社区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持者。20世纪20年代,鼓浪屿近代教育发展迅速,教育结构日益多元化,逐步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职业学校等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兴办小学6所、中学7所、职业中学1所^[23]。闽南籍海外移民为鼓浪屿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资金和人才的积极支持,贡献巨大。“富人阶层给各种各样的学校施予大量捐款,对这项伟大的事业继续慷慨的合作”,“居住在海峡(指新加坡)、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厦门人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关注”^[24]。印尼华裔黄奕住提供

慈勤中学常经费15 800元,占厦门市全市中学经费的5.8%,占华侨补助厦门中学经费总数的92.9%。据统计,1927—1937年黄奕住捐助慈勤中学经费总额高达30万元以上^[25]。

四、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与鼓浪屿国际社区构建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采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方法,在统计分析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厘清了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与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正相关关系,揭示了移民企业家群体对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重要影响。

1. 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的籍贯分布,绝大多数集中在福建,特别是厦漳泉闽南地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6]。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在闽南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就闽南籍海外移民企业家而言,爱国爱乡、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心怀故土家园,积极回报乡梓,助学兴教、投资经济建设,有力推动了侨乡社会的现代变迁。

2. 近代移民企业家来源于海外,其侨居地(南洋各地)在西方殖民扩张下早已殖民地化,欧风美雨的侵袭使它们相比晚近的中国具有更多近代化特征。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在南洋各地生活、从事工商业活动,必然会获得国内人士难以企及的经验、阅历和眼界,热衷于投资和引进新式行业^{[17]132}。事实上,这一群体的大量迁入,导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权,必然从西方人转到华人手中。

3. 早期经济压力下出洋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以闽南籍为主),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几乎都被剥夺殆尽,在侨居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欺凌和迫害。惨痛的切身经历,使他们深感良好学校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返乡后积极致力于家乡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建设。这种投资,“体现了华商的非理决策的倾向”^[27]。

4. 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以工商业者身份为基础,形成了身份的多重叠加。他们以改善桑梓为己任,跨国实践扩展到

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聚集起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放大了群体活动能量,成为侨乡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推动侨乡近代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结 语

近代以来,基于世界和中国近代历史格局的变动,鼓浪屿经历了由东南沿海乡村早期聚落到近代城市社区的演化。特别是20世纪的前40年,随着南洋各殖民地返乡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的聚居,鼓浪屿更是进入了近代发展的黄金期,成长为华洋共居共处的国际社区,在建筑风貌、社区治理、市民精神、文化多元性等方面形成了迥异于公共租界的样貌特征。

从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绝非西式文化与西式文明单一影响的结果,最大的推动力量来自海外返乡的移民企业家群体。在近代特定的时空背景形塑下,聚居鼓浪屿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质明显: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熟悉西方近代文明的种种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近代化特征明显;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但投资家乡教育、文化事业意愿强烈;财力雄厚,身份多重叠加,社会影响巨大。基于上述特质,闽南海外移民企业家群体必然地成为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构建的主要推手和重要贡献者,近代鼓浪屿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呈现出多元并置的面相和复杂图景。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作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在鼓浪屿这样一个狭小空间,尤其明显和集中,因此更具研究的样本意义。

[参考文献]

- [1] 何丙仲. 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 [2] 郑振满.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J]. 清史研究, 2002(2): 24-25.
- [3]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194.
- [4] 水海刚. 移民企业家与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 地域经济圈的视角[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8

- (3): 65-74.
- [5] 厦门市档案局, 厦门市档案馆. 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7: 328.
- [6]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泉州市华侨志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400-401.
- [7] 周子峰. 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 (1900-1937)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 [8] 林金枝. 论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及其作用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7 (4): 109-124.
- [9] 顾德曼. 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 (1853-1937) [M]. 宋钻友,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
- [10] 李恩涵. 东南亚华人史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 [11] 林金枝, 庄为玟.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福建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17.
- [12] 杨宏云.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跨国实践与认同流变——以印尼华商为例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11.
- [13] 周旻, 主编. 鼓浪屿研究: 第2辑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119.
- [14] 黄新华, 陈芳.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J]. 鼓浪屿研究, 2019 (1): 1-39.
- [15] 姜龙飞. 上海租界百年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 189.
- [16] 夏军.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治理的遗产价值 [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9 (5): 34-39.
- [17] 戴一峰. 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 [18] 吴瑞炳, 林荫新, 钟哲聪. 鼓浪屿建筑艺术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7: 10.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鼓浪屿申遗文本 [R].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2016.
- [20] 洪思明. 东西方视域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语言文化交流研究 [C] // 何瑞福. 鼓浪屿研究: 第7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7.
- [21] 王兰娟, 陈少牧. 闽南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历史作用与时代价值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 62-66.
- [22]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 《厦门海关志》编纂委员会.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0: 359.
- [23]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 厦门文史资料 [G].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0: 58-62.
- [24] 毕腓力. 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故事 [M]. 何丙仲,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158.
- [25] 赵德馨. 黄奕住传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254.
- [26]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第2辑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28.
- [27] 潘淑贞. 当代菲律宾华商在华教育投资与管理的特点——以闽南地区为考察点 [J].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 30-37.

Moder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ulangyu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N Feng¹, CHEN Fang²

(1.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fice, Gulangyu Isla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Xiamen 36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century, Gulangyu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settlement space into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odern life. The immigrant entrepreneur group w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Gulangyu'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with its capital, national feel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and modern concepts and visions. Using social scienc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ulangyu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ulangyu Isl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group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陈蒙腰)